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增订新版〕

龚育之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北京



2000年作者访问德国参加中德人权对话

作者小传

龚育之，男，1929年12月生于湖南。194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到1966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任干事。1980年后先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调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1995年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1999年不再担任行政职务。现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会会长。曾参与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的写作，著有《龚育之文存》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中汇集了《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大书小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论旗走笔》、《论中共党史》、《科学·哲学·社会》、《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十部著作的主要部分。近作有《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99年作者在上海黄浦江畔



2000年作者访问西藏路遇藏民过望果节

目 录

总 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3
邓小平论毛泽东	24

论南方谈话

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	43
---------------------	----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

——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	52
-------------------	----

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

——围绕邓小平有关论述的对谈录	113
-----------------------	-----

论十四大报告

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	143
-----------------------	-----

精髓·前提·哲学基础

——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48
-------------------------	-----

新的革命·新的理论·新的旗帜

——十四大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163
--------------------------------	-----

线索和阶段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208
-------------------------------	-----

论《邓小平文选》

- 从南方谈话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33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 291
- 关于新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 317
-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读《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350

悼邓小平逝世

-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 363
- 两大历史关头的道路选择 373

论十五大报告

- 十五大精神和党史研究 389
- 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421

论建党八十年

- 为建党八十周年和历史决议通过二十周年与记者
的谈话 437
- 明确的目标 艰辛的探索
——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而作 442
- 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
——纪念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452

- 增订新版后记 478

总 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两位伟人：毛泽东与邓小平

记者：在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缅怀毛泽东的伟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问题又成为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龚育之：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应该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来认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那么就有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 这是作者答《经济日报》记者高路问，发表在1993年12月24日《经济日报》上，收入本书时又作了一些补充。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史和我们党史可以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毛泽东领唱的，下篇是邓小平领唱的？

龚育之：上、下两篇之间发生了一个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要求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在一起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不光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到一位年轻人说，中国搞现代化，最有希望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凯那个时候，坏就坏在辛亥革命把中国搞乱了。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

记者：看来，您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指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伟人，不是没有所指的。

龚育之：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

记者：毛泽东夸邓小平“人才难得”，评价也很高。我听说，毛泽东还曾更具体地夸小平同志办事公道、稳当、看问题有眼

光。有没有这回事？

龚育之：有。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在他推荐小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时说的。在讨论党的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提议设总书记并推荐小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1956年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安排作了说明。小平同志表示，他还是比较安于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接着就夸了邓小平同志的那些优点。

记者：很有必要宣传宣传毛泽东对小平同志的这个“宣传”。

龚育之：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记者：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过不少肯定的评价，但得到他这样高的评价的大概不多。那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您认为有哪些共同点？

龚育之：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我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讲共同点，我认为，强调“实事求是”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小平同志讲毛泽东思想，讲得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认

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自己说，我就是实事求是派。他在南方谈话中又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有人不大赞成这个提法，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好几本，讲了那么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思想……，怎么可以只讲“实事求是”四个字呢？其实，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有那么多适合中国情况的创造，根源就在于他能够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外国。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新的情况，自己去创造新的理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当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当年得出了许多具体结论，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一百几十年，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1989年5月，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我们今天也不能躺在前

人的书本上，而要以前人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面对新的实际去进行新的创造。如果后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只限在前人的具体结论的框子里，就会束缚住自己的头脑和手脚。还是当年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时讲的，不要照搬具体结论，而要掌握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个方法面对中国实际，解决新问题。前人的科学成果要学习，要研究。归根结底，要拿到今天的客观实际中去运用，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有的是苏联提供的模式，有的是毛泽东后期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不因袭这些，而是抓住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所有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结论，重新拿到实践、拿到时代发展中去检验，这样他才能有创新，才能有突破思想樊笼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而开创出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记者：这个共同点太重要了。请谈谈其他的共同点。

龚育之：邓小平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也有很大的共同点。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战略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农村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难在它是一条新路，不是传统的路，不是俄国革命已经走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到农村去，似乎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农民结成同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今天邓

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从战略上讲，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来讲，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到农村。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村是否稳定，生活是否改善，关系中国大局。某种意义上，农民的改革要求也最迫切，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也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不像城市那么复杂。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着手，取得了成功。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又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说，八十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吃的是农村改革这碗饭，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也是由农村改革启动的。

我看，在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农村和农民这一点，就抓住了中国特色。不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能理解这个战略基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有透彻的了解，他们和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村有血肉联系，因此知道农民问题在中国的地位，知道怎样把握住这个基点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记者：还有什么共同点？

龚育之：再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时深刻阐明过的。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犯革命急性病，急于实现全国革命高潮，看不到中国这么大个国家，革命在不同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区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中国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的不平衡，就属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是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让一部分地区、一

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就属于这个方面。从战略思想上讲，这就是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等的平衡，从这个基点出发，在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平衡发展带动共同发展，求得将来相对的平衡发展。如果过早设想拉平，不仅本来可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上不去，全国的发展也给拖住了。像这样重大战略的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很多相通的共同的地方。

记者：希望使中国尽快一点富强起来，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点。

龚育之：这也是孙中山同他们的共同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共同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记者：在我印象中，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好像是小平同志概括出来的。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的人认为需要作些解释。

龚育之：这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记者：请您谈谈这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吧！

龚育之：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记者：讲继承和发展，听起来似乎比较习惯些，把纠正也当作一条，而且排在第一条，恐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

龚育之：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方面。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

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出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缺乏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魄力和本领。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

1983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时候，我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站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来，“力排众议”（“力排众议”这个词我没有写进文章中去），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讲继承。讲继承这一条同讲纠正这一条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讲得清楚。所谓“力排众议”这个“众”，当然不是“大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是党员的

大多数。党内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是赞成小平同志这种主张的，这种主张并不孤立。但是，也的确是“众”，是“小众”，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赞成，或不很赞成、不全赞成，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所以要“力排”。“力排”这样的“众议”，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小平同志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使我们党在这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中转得比较顺当，比较平稳，比较健康。没有第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没有第二条，转折就可能转不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这两方面又都面对势头相当强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需要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掌握住历史的舵轮。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掌舵是什么意思。

记者：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寻常人做不到的。

龚育之：而且还要说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论。小平同志处在有影响的地位，又有这样的魄力和魅力，又讲出了一番道理，同全党一起讨论，集中全党智慧，不仅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对历史是非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今后的道路作出科学的规划。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

总之，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举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